

敏感而脆弱的时代之魂 ——阿成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

◎尹传兰[苏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苏州 215123]

摘要 知识分子阶层在阿成的笔下一改传统文化“守灵人”的角色,成了普通大众中的一员。如《欧阳江水绿》中的欧阳、《金黄色的杏》中的老孔、《闲话》中的老附、《咀嚼罪恶》中的“我”等等,他们既有知识分子的清高与孤傲,又有平凡人的私心与庸碌。从他们身上我们可隐约觉察出时代变迁给知识者们带来的影响。

关键词 阿成 知识分子 时代之魂

一、世俗雅人 四处碰壁的理想主义者

身为知识分子一员的阿成是最了解知识分子的,他既体验到他们的优点,也深悟出他们的不足,既看到他们的得意,又明白他们的痛苦。在阿成眼中,知识分子在社会上和普通劳动人民的处境是大体相同的。而他们高于普通人的敏锐和感悟,以及他们身上所烙下的“启蒙”、“精英”的痕迹,又造成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的痛苦和悲剧。透过他们,可以折射出整个社会的全貌。只有了解到这一点,才能正确认识阿成小说中的知识分子形象,才能了解阿成对知识分子形象塑造的意义。

鲁迅先生认为,知识分子是掌握文化资源的先进阶层,“这些知识者,却必须有研究,能思索,有决断,而且有毅力。他也用权,却不是骗人,他利导,却并非迎合。他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做自己的喽罗。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这就是鲁迅所提倡的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即具有独立人格与责任意识。而在王朔的观念中,这种完美的“理想人格”似乎只能停留在理想状态。他以自己的方式消解了知识者的文化启蒙功能,赋予其市井化的“俗人”气息。对知识分子身份认知的巨大转变,正是社会发展转型的缩影之一。事实上,无论是将知识分子作为拯救国民的先决者,还是将其视为世俗世界中的一员,都未能全面地展示当今知识分子生存的真实状态。这不是知识者的全部。“显然,我们不能将这种虚拟化知识者的人生依习惯看做是对生活的真实表现。或者说,作家们对知识者虚拟化形象的热衷很容易让善良的读者们以为这就是知识者的全部真实。这是一种可怜的遮蔽,是一种让常规的文学观念与对知识者态度‘无明’的遮蔽。”而阿成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正好填充了启蒙与世俗之间的二元对立的空白,展现了这些世俗雅人的生存实境和心路历程,给人耳目一新的审美体验。

阿成笔下的知识分子——欧阳江水绿、老孔、老郭、老宋、黄先生、任先生等,他们没有特定的名字,阿成用这些表“类”的模糊称呼,其实是有隐喻意味的。唯其如此,他们才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可能是“你”、“我”,也可能是“他”,所有知识分子似乎都能在他们身上看到自己的某些侧影。这些文化人,并不是知识阶层中那些负有着社会忧患与民族大义的上等“精英”。但如果将这些知识者、文化人放在宏观的文化背景上考察,多少可以体会到阿成写这类人物的深意。

他们都饱读诗书,带着知识分子特有的清高理想,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怀才不遇、四处碰壁。如《行走在路上》中的王先生、黄先生等,《胡天胡地胡骚》中的韩先生、刘先生等人,他们似乎都颇知文字奥妙,不无好为人师之习,却也登不上大雅之堂,只能动不动给人来一番文字的启蒙,俨然一副严师学者风范。而那精通英语、地理的文疯子除在繁华的大街上走,动辄甩一甩象征文化人的长发以引起人们的“观赏”之外,世人并不以其为然。文化知识似乎并没有给他们低微的人生命运带来多少亮色,甚至连媳妇也娶得较常人晚。我们眼前仿佛涌现出这些先生文雅却艰难、文静却尴尬的挣扎身影。透过这类文化人的生存处境,深入揣摩感受之,不乏一种寒意的凄凉。

知识者的理想常因冷峻残酷的生活挤压而走向市俗化。《欧阳江水绿》中的欧阳就是深受“文革”影响的“知青”代表。他一方面有着农民般的善良和朴实,一方面又有很深的投机取巧甚至是龌龊的思想和行为。单纯之中不乏轻薄浅陋,轻率放任之中又蕴含着坦诚真挚。这真是一个性格难以说清的文人。他的性格是复杂而变动不居的,

多维的生活境遇中体现了其性格的多重性。当刘老师说没有当上官,是因为“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时,“欧阳江水绿脸上的傲慢与嘲弄一下子不见了,继而是尴尬与愈加浓稠的真诚,他要赞叹,竟下意识地同刘老师握了手,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都是哥们儿啊。’真叫人忍俊不禁。“有疾”与“好色”重在“好色”。推而广之,知识者饮食男女的欲望与常人实际无异。正因如此,阿成笔下的知识者更经得起时间的淘洗。

《闲话》中的老附,是一个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知识分子的典型,有李白的风流倜傥和魏晋士人的儒雅,生命像盛开的向日葵一样散发着迷人的光芒,周身上下浸润着一种昂扬的进取精神,成为女性倾慕的对象。但是,“文革”犹如飞来横祸使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阴影,彻底改变了他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他开始堕落、滥情、无所事事、游戏人生,让人看着忍不住悲叹。同样,老尤原本也是个才华横溢的人,却屡屡为情所伤,妻子被朋友拐走,他无力使所爱的人对自己忠贞,遂看破红尘遁入空门,从此一蹶不振。

在这里,老附和老尤与生俱来的那种脆弱,在残酷的环境面前不堪一击。他们缺少平民百姓那种为了生存而拼搏的斗志,这或许是其悲剧人生的关键所在吧。相比于民间勃发的生命意志,知识分子的自尊与矜持有时显得苍白而空洞。

《金黄色的杏》中有位学者老孔,喜欢拿着一些别人不认识的生词僻语难为他人,不免有好为人师之嫌。他最大的特点就是浑身带刺,牢骚满腹,尤其喜欢对一切常规与定论说“不”,甚至敢于当面顶撞领导。以至于别人见他一张嘴就马上躲得远远的,很多会议也都向他关上了大门。然而,若干年后,他终于在严酷的现实面前偃旗息鼓、一败涂地——知识分子原有的激情与坚韧被社会无情地扼杀,他在无人问津、孤掌难鸣的环境中除了悲伤与哀愤,原本的自尊与荣耀也都在历史的滚尘中丧失殆尽。退休后,“我”有感于他的“直率与执著”而去照顾他,请他出席一个座谈会,而此时的老孔,已与先前判若两人,只是一言不发地吃光了桌上的一大盘金黄色的杏……唯一保留的是知识分子那种“爱面子”的郑重其事。阿成特意描写了老孔参加会议的“衣着外貌”,并感叹知识分子最容易把没有任何价值的会议搞得正规起来。面对老孔那种失去了知识分子的批判锋芒,而被历史改造成一个庸人的事实,作者固然感慨万千。但对主人公孤寂、落寞的情状,也投以深切的怜悯与极大的宽容。

阿成知识分子题材小说突出的特点就是“互文性”手法的运用。互文性是指“任何文本都是由引语的镶嵌品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收

和转化”。

上文中的老孔就很容易让我们想到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甩不掉文人面具的文人之哀。我们可以将他看做是“孔乙己”的简称,而这个短篇则是现代意义上的孔乙己的继续。首先,在人物性格和行为上,阿成的“老孔”和鲁迅的“孔乙己”同样喜欢咬文嚼字,同样好为人师。孔乙己教授孩子“茴”的四种写法,老孔则在供职单位出些难题考别人。其次,在命运遭际上,同样是在残忍的现实和恶劣的环境中丧失了人格与尊严。孔乙己被科举抛弃,但他自己依然保持了读书人的骨气,他是“唯一穿着长衫站着喝酒的”,老孔则在忍受冷落与寂寞的漫漫人生中,忽然有一天接到邀请之后,“打扮得很利落,西服、衬衣、领带,都是重大节日穿的,现在他都架上了。”对此,阿成说:“这就是当今的知识分子,把一个扯淡的事,一下子弄得庄重起来了。”让我们不由自主对知识分子坚守自身与自重产生一种讽笑后的尊重。再者,两人都走向了落寞和寂寥的人生坟墓。如果说孔乙己之死是外在的无奈,而非本心的放弃,即便有“窃书”一事,也成就了读书人安身立命之说。那么老孔的遭际则传递了外在压力与内在妥协的悲凉。一句“我老伴儿过世的时候,学校就去了一个办公室主任,而且不得不去。我不想在我死的时候就您老弟一个人来给我送葬”,便是印证。退一步说,即便老孔在现实面前低下了头,就真能避免孤独与落寞的命运吗?

不同的是鲁迅对孔乙己的堕落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当时封建社会和科举制度对知识分子肉体的戕害和精神的摧残。而阿成则怀着十二分的同情与宽容,默认了老孔似的知识分子在现实面前的悲惨命运。这种理解与谅解无不显示出作者在历经世事沧桑后的“悲观与绝望”,此种态度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读者的心灵共鸣和情感认同。这种叙述,在我们心中造成一种“陌生化”效应,从而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现实世界果真如此吗?我们的理想和愿望在残酷现实的摧残中,果真是那么脆弱、不堪一击吗?到底是阿成的“悲观”还是现实的残忍?这也正是我们需要探究的生存本质。

二、罪恶与忏悔 重建中的灵魂

《咀嚼罪恶》是阿成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它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将知识分子灵魂中的阴暗面,像医学解剖般一层一层毫不遮掩地剥露出来。读后会产生“我”是一个真真切切存在的复杂的人的感觉。作者以“咀嚼回忆”的特殊方式,对个体生命现象不断地进行反思、体悟和忏悔,活脱脱地勾勒出一部善与恶并存的现代

知识分子的心灵史。

新时期以来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新写实文学等思潮的交替出现，一定程度上使作家在对历史进行反思的过程中突破了文学的范畴和意义，完成了由揭露社会问题到探求人生价值、思索人性存在的跨越性过渡。尤其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降，在“新写实”突出强调人的主体性和注重书写普通人的生存处境的背景下，阿成的长篇处女作《咀嚼罪恶》自然也不免打上了时代思潮的烙印。但是，与“新写实”不同的是，阿成在此“紧守严肃文学阵地的同时，以略带自虐的残酷方式，大胆走出一种独异但又具光彩的哲理小说新形式。这大概在精神层面上避开了改革文学的思潮并袭，而多少拥有了一点先锋派文本形式的影子”。而且他能够真实地、有所创新地在静观“罪恶”的过程中，不忘其作为知识分子的忧患意识。

《咀嚼罪恶》中，阿成在每一章的开始部分都引用了科斯卡托、科恩、尼采、叔本华、考什布克、马莱等西方哲人的名言警句来忏悔自己的罪恶。众所周知，卢梭的《忏悔录》是一部自传性质的伟大著作，是一个激进的平民知识分子在封建专制压迫面前捍卫普通人的权力和尊严的作品，也是一部情真意切、咀嚼罪恶的忏悔之作。“没有可憎的缺点的人是没有的。”这既是卢梭对人的一种看法，也是他对自己的认识。在《忏悔录》中他做如此宣布：“我现在要做一项既无先例，将来也不会有人仿效的艰巨工作。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我“既没有隐瞒丝毫坏事，也没有增添任何好事……当时我是卑鄙龌龊的，就写我的卑鄙龌龊……”这种勇敢地剖析人性丑恶的行为的确“无先例”，但却后继有人。如果卢梭能看到阿成的《咀嚼罪恶》也许会为之震惊。

《咀嚼罪恶》同样在开篇就说“我”是个坏蛋、伪君子、十足的骗子，是人类的一个渣滓，并大谈自己的心力衰竭病。继而披露“我”在爱人去西宁后欺骗和背叛了她；为了掩饰自己的满头白发而去理发店染成黑发，以此欺骗“情人”；“我”还曾帮助母亲去殴打父亲的“老情人”，作为一名作家虚荣心使“我”连自己的出生地都隐瞒，将一面坡说成哈尔滨……从中我们分明可以嗅到“本我”的原初生命冲动的气息。“本我”是弗洛伊德人格三结构的最底层。他在《自我与本我》一书中，将人的人格划分为“本我”、“自我”和“超我”三部分。其中“本我”是人的心理结构中最原始的构成，其中充溢着被压抑的本能、欲望和冲动，它们来自生命本源的心理需求，完全处于无意识的状态之中。因此在现实中常常受到压抑和遏制，这种被阻碍的原始本能在内心长期郁结，就会形成一种潜在的“情结”，发展到极端就会导

致精神疾病的发生。而“超我”则是伦理化的“自我”，是社会规范、道德观念、价值原则等在人的心理结构中的内化，属于后天的精神积淀，带有理想的特征。“本我”按照“快乐原则”要求无节制的欲望满足和情感宣泄，“超我”遵循“道德原则”对其加以控制，两者各持一端。如果完全按照“本我”行事，虽然本能欲望暂时得到满足，但从根本上无视人与动物的区别，必然会受到社会规范的惩戒，倘若完全听从“超我”的指挥，总按照理想实行自我控制，人生便会失去生气，成为苦难的禁欲主义者。而调和二者偏执的中介是“自我”。“自我”代表着理智，以现实原则驾驭“本我”的活动，既让人的生命欲望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又不会超越社会道德的樊篱。但本能和理智，欲望和觉悟的冲突，恰是人的精神生活的一种根本困境。其冲突的结果是，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情况下“自我”的调节作用失衡，往往导致本能和欲望占上风，于是“罪恶”便产生了，尤其是对那些神经敏感的知识分子。

《咀嚼罪恶》中的“我”作为一个知识分子，“在他看来，人有自己的本性，人的本性包括了人的一切自然的要求——他又把人身上一切的原始本能的要求当做正常的自然的东西全盘加以肯定。”“我”虽然对自己背叛真挚爱人的感情深感内疚，但“我”仍以知识分子的思维来“原谅”自己，把自身的罪过归于“父辈”，归于“原欲的冲动”。“我毕竟是祖辈流传与社会形态共同制造出来的一个‘畸形’的作品呵！”在“我”看来，虽然自己曾经做过很多卑下可耻的事情，如自己的独白所说：“下流与龌龊的事情组装了你的大半生”，但“我”将非理性的“原欲”渴望作为导致“罪恶”出现的根本原因。“我”背叛了对恋人的感情，与一个女劳模走到了一起，这本是种“罪恶”。而这时人格中最深层的“本我”控制了主人公的灵魂，使他忘却了“自我”的“现实原则”，更不用说“超我”的道德理想了。所以，作家这样叙述“我”与“女劳模”间的关系：“因为她对我很好”，“给我带饭煎刀鱼”，“送我衬衣”，而“我”当时觉得这一切那么顺理成章，那样的自然。这一逻辑最直接的表现是在女劳模被打倒后，“我塞给她二十块钱”。“我”试图通过对自身错误过程的忏悔叙述，去掩盖那本来十分含糊的“自私”本质。这里，阿成用“反讽”的手法，将“我”的伪善与自私揭示得淋漓尽致。

然而，“我”毕竟是个知识分子，在自己“罪行累累”的现实面前，“我”还拿《古兰经》的经语“真主将允许他意欲的人悔过自新”这样冠冕堂皇的“哲理”来掩饰“本我”犯下的罪行。就像张贤亮笔下的章炳麟时不时拿出马克思恩格斯的话来慰藉“无意识”的丑恶一样，这也是很多知识者人性中的矛盾与冲突。作品并未叙述“我”与

“女友”的分手经过,只是一味地忏悔自己的罪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在掩盖“我”的罪恶的一种方式。这种欲盖弥彰的语言表述,使“我”罪恶的道德观更凸显于人群之中,常人的“罪恶心理”展现的更加充分。

知识有时会使人将罪恶隐藏得更深,所以知识分子“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这也许正是知识者的生存本相。其表温文尔雅、文质彬彬,其里则是懦弱苟且甚至粗俗不堪。阿成笔下的知识者会提供给我们认识了解他们的较全面的审美内容,同时这类俗人中的雅人们真实的人生境遇也提供给我们一种新颖独特的审美感受。这种感受会把我们从美化或丑化的思维定式中拉出来,从而看到知识者那种固有的平凡“人性”。

在阿成的小说中,知识分子是个尴尬的阶层:一方面,他担负着社会启蒙和救赎的作用;另一方面,却在现实的残酷面前失去自我。因此,当整个社会的价值评判标准倾向权力和金钱时,他们的生存就显示出特有的困顿和尴尬。如《年关六赋》中的老三《胡天胡地胡骚》中的作家老王《烤肉》中的阿成等。在某种程度上金钱阻碍或扭曲了他们原本浪漫的理想情怀。或许正如阿成在《戒台寺》中所说“世界变,而他不变,真的是一个谜”。面对金钱和权力,知识分子除了无奈还是无奈。但是阿成并没有因此对知识分子失去信心,他对知识分子的启蒙意识还是充满期望的,同时对知识在人类社会进步中的作用也有着坚定的信念。☐

林双泉.“摩罗诗人”与鲁迅早期心目中的理想人格形象
[J].福建师大福清分校学报,2008(4):54.

刘绍信.对人间的挚爱关注:雅俗景观——阿成小说论[J].学习与探索,2002(2):111.

[美]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M].台北:台湾传记文学社,1985:225.

曲光楠.论《咀嚼罪恶》的文本思维特征[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2(3):65.

[法]卢梭.忏悔录(第一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27.

基金项目 2011年度苏州大学研究生“卓越人才培养计划”
——博士研究生学术新人奖

作者 尹传兰,苏州大学文艺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

编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编者手记 郭子君

自《名作欣赏中旬刊》2012年第四期推出“博士之声”栏目后,几期编下来,得到了众多在校攻读博士学位的研究生的大力支持,其显著标志是,来稿日渐增多,内容日渐丰富。在此我们要发自真心地道一声:谢谢!

在编读过程中,我们深深地感到,博士生们确实学有所长,所写的文章,有学术含量,有学术深度,且时时有新的发现,新的见解。一代青年学人,前程远大。

如果博士研究生们能够把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见解,用更公众化的语言,让更为广大的读者领略其中的意义、妙趣,那就更好了。如果博士研究生们能够不仅仅论及自己专业领域的问题,而且还能以自己的学理之长,论及目前公众所关心的社会文化问题,那就更好了。我们期待着。